
近十几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述评

魏华龄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被誉为“文化城”,可见其文化的繁荣和鼎盛,当时,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于抗战文化,对于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左”的干扰下,研究桂林抗战文化居然成了禁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研究桂林文化城和桂林抗战文化才得以开始,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工作逐步走向深入。

一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

1979年冬,《广西日报》副刊率先恢复了“桂林文化城忆旧”栏目。接着,自1980年起先后有《广西文艺》开辟了“烽火桂林”,桂林《漓江》开辟了“文化城忆昔”,《桂林文艺》开辟了“回顾文化城”,《桂林日报》开辟了“桂林文化城忆昔”等栏目;其后,广西社会科学院院刊《学术论坛》开辟了“桂林抗日文化”,《广西社会科学》开辟了“桂林文化城研究”专栏。所有这些报刊开辟的众多专栏,为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为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汇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在80年代初期,桂林抗战文化这一重要课题,即

已成为许多报刊的热门栏目,成为许多文化界人士和专家学者撰稿的重点。

与此同时,桂林市文化局于1980年春成立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陈列馆筹备处”,对桂林文化城的史料进行广泛的采访和征集。广西戏剧研究室,对抗战戏剧史料的征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秋,广西社会科学院与广西师范学院联合组成桂林文化城研究组,征集、整理抗战时期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1984年,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设置了抗战文艺研究室,专门从事抗战文化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研究工作,1988年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1984年,桂林市博物馆借“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4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专门举办了一次“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物史料展览”,展出了历经战火和“文革”浩劫,幸获保存下来的部分文物史料。1988年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50周年,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和展览。1991年是新中国剧社成立50周年,桂林博物馆举办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专题陈列。在全国文化系统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座谈会的推动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于1989年7月成立了广西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委员会,出版了《广西新文化史料》刊物。所有这些组织机构及活动,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92年桂林地区教育学院在该院中文系正式开设了“桂林抗战文学”专业课程,这在全国还是首创,不仅对桂林抗战文学提供了一个讲坛,而且也使前辈们开创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有人来继承和发扬。

在这一时期内,除了桂林、广西当地的各级领导和文化主管部门开始重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之外,在国内,四川是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了抗战文艺课题组,并于1981年就创刊了《抗战文艺研究》(季刊);该院还与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了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先后召开

了三次抗战文艺研究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海外,1980年法国巴黎举行了一次抗战时期中国文学讨论会,中国作家出席了讨论会;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于1981年举办了“中国40年代文学讨论会”。上述这些学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既刺激了中国抗战文艺的研究,也推进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除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外,文艺工作者也有贡献:一是1988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陈敦德编导摄制了一部《桂林文化城》电视文献纪录片,共四集;一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反映桂林文化城出版战线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欧阳文彬、费三金著,1981年出版),作者欧阳文彬当年就在桂林文化城生活和工作,经历了当年在出版发行战线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该书正是这场斗争的艺术再现。

二 资料的征集和整理,专著的出版

史料的积累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一些老同志率先行动起来,从1979年开始,当年在桂林文化城战斗过的林焕平教授首先撰写了长篇回忆资料《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叠彩》1980年第2期),魏华龄写了《欧阳予倩与桂林剧运》(《广西日报》1979年12月23日)和《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盛举——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漓江》1980年第1期),万一知写的《桂林文化城纪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3期连载)和《茅盾在桂林的文学活动》(《桂林文化》1980年第2期)。从此,逐步在全区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写文化城、研究桂林文化城的热潮。

在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整理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首先要推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的支持下,编辑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这套丛书计划出版11种,从1984年到1992年已经出版7种,371万字,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丛书”第一本是《西南剧展》(70万字),这是为配合“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座谈会”而编辑出版的。由广西戏剧研究室、桂林图书馆主编,丘振声、吴辰海、唐国英编选,198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内容由剧展概况、剧展反响、剧目评论、剧人回忆等四部分组成,收入上述四方面资料300篇。

《桂林文化城纪事》(52万字),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潘其旭、王斌、杨益群、顾绍柏编选,198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资料97篇,主要是抗战时期旅居桂林的文化人1983年5月以前所写的回忆录,也有一部分是在解放前留下的回忆,反映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战斗历程和辉煌成果。

《桂林文化城概况》(37万字),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主编,杨益群、王斌、万一、潘其旭、顾绍柏编著,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有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大事记,文艺报刊介绍,文学书目,文化人名单,以及出版单位、印刷厂、文艺团队、演出剧目一览表等,通过此书,读者可以了解整个桂林文化城的概况。

《〈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36万字),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杨益群、王斌、潘其旭、顾绍柏编选,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从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80种期刊中,按小说、传记、散文、诗歌、剧本、歌曲、美术、译作、文艺评论等12大类编排,检索方便。

《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38万字),广西艺术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丘振声、杨荫亭编选,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为纪念欧阳予倩逝世20周年而出版的。此书共收资料75篇,分三辑:一,欧阳予倩论桂剧改革;二,时代的呼声、改革的反响;三,深切的怀念、光辉的业绩。

《旅桂作家》(74万字),广西师范大学主编,苏关鑫、雷锐、黄绍清、肖绍惠编写,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旅桂作家34人,每一作家所收资料分:一、在桂活动简况(大事记);二、在桂作品简介;三、在桂报刊评介简介。

《戏剧运动》(64万字),广西艺术研究所、广西社科院、桂林图书馆主编,吴辰海、丘振声、唐国英编选,199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资料217篇,分剧运论、剧作论、剧改论、新歌剧论、演出论等五辑,都是有关桂林戏剧运动的论文、评论、座谈纪要和通讯等。本书在戏剧资料方面可以作为《西南剧展》和《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两个专集的续篇。从三个戏剧专集中大体可以了解抗战时期桂林戏剧运动的历史轮廓,以及它的特点和规律。

其次,要推桂林文化研究中心、桂林图书馆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这是一本210万字的大型资料工具书,1987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大事记之外,还有“桂林文化分类一览”(收入:演出团体、演出活动、演出曲目、美术活动、教育会议、学术活动、体育竞赛一览等)和“桂林文化分类简介”(收入:文化机构、演出团队、演出剧目、剧院影院、书店出版社、期刊、报纸、学校、著译、人物简介等。)

此外,还有桂林博物馆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物史料选辑》(14万字),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座谈会办公室编的《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座谈会资料集》(30万字)。杜宣主编的《驼铃声声——新中国剧社战斗历程》(23万字),罗标元等编的《桂林旧事》(26万字),桂林“八办”纪念馆编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54万字),《漓江烽烟》(共三册50万字),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的《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19万字)和《国际新闻社回忆》(17万字)以及广西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辑室编的《广西出版志资料(四)——桂林文化城出版事业专辑》(27万字)等。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2年底止已出版和已编待出版的桂林抗战文化史资料汇编已达20多种,字数超过一千万字(一些单篇史料除外)。

自80年代中期起,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到1992年底止,已完成学术专著7部,240万字,其中林焕平著的《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8.7万字),1982年浙江人

民出版社出版,魏华龄著《桂林文化城史话》(15万字),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抗战文艺辞典》(65万字),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建平著《桂林抗战文艺概观》(12万字),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雷锐主编《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55万字),199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魏华龄、曾有云、丘振声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38万字),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广西社科院文学所主编《桂林抗战文学史》(45万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除了上述专著之外,各地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还先后写了上百篇学术论文。1991年魏华龄、曾有云、丘振声等人从大批论文中选出35篇,编辑出版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38.5万字),内容涉及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分期、地位、作用;涉及文学的各个领域——小说、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特别是西南剧展;及对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也涉及新闻和出版;还论述了中共对桂林文化运动的领导及其历史经验。为了让读者了解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书后附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论著、论文要目》,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份索引。

三 研究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关于桂林文化城的成因问题。桂林文化城的成因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大部分论者认为:首先是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造成的;其次是由于桂林的特殊地位,即地理和政治的两个方面,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蒋桂矛盾的存在;第三是在国民党和桂系里面,有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即国民党左派;第四,最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林文化城的灵魂。(魏华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也有个别人持不同见解,如《桂林文化城》电影文献纪录片在“导演阐述”中提出“携手并肩”论,曹裕文认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桂系坚持抗日的

方针,实行开明政策的结果”;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起到“加速了抗日文化城的形成”的作用。很显然,该文作者实际上认为文化城的形成,是桂系与中共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两者的关系中,作者认为桂系是主要的,是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共是次要的,只是起了“加速”的作用。(曹裕文:《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成因之管见》,《广西党校学报》1989年第5期)。

关于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分期问题。在起止时间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始自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终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这是一种基本的看法;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陈迹冬:《回忆桂林文化城的几个片断》,《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姚蓝:《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及党的领导作用新探》,《广西党史通讯》1991年第3期)。在分期上也有两种意见:一种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杨益群:《桂林抗战文化》,《广西社会科学要览》第240页)。另一种意见是划分为三期,即1938年10月—1941年2月;1941年3月—1942年1月;1942年2月—1944年9月(李建平《桂林抗日文艺运动的几个发展阶段》,载《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关于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问题。大部分论者充分肯定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巨大贡献和历史作用,认为:桂林抗战文化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把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桂林抗战文化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艺术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宝库;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桂林抗战文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锻炼、造就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文艺新军和文化战士,为新中国培养了人才,准备了文化建设的骨干。

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在“文革”中曾被诬蔑为“黑剧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界和戏剧工作者都很关注这一问题,于是先后著文论述西南剧展,

实际上是为西南剧展拨乱反正,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这一时期内,研究者从资料搜集到学术研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西南剧展举办的历史背景,到剧展的历史意义以及中共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剧展在中国戏剧史上地位作了充分肯定。1984年桂林举行了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座谈会,数十位当年的“戏剧兵”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回忆和讨论,是桂林抗战文化各个领域取得全面丰收的一个方面。

关于作家研究。这一时期,对旅桂作家的研究,也有广泛的接触,论及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夏衍、胡愈之、欧阳予倩、邵荃麟、艾芜、司马文森、王鲁彦、柳亚子等,而重点是对茅盾、艾芜、王鲁彦、田汉、欧阳予倩、柳亚子等人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他们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和贡献作了充分肯定。

14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成果,的确是硕果累累,形势喜人。但从桂林抗战文化的总体研究来说,对这一课题的内涵和领域,当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研究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许多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市政协)